

[印] 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刘民权 夏庆杰 王小林 等著

从增长到发展



从增长到发展

[印] 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等著
刘民权 夏庆杰 王小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增长到发展/ (印) 森 (Sen, A.) 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446-8

I. ①从… II. ①森… III. ①经济增长-研究②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061.2
②F0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7677 号

从增长到发展

[印] 阿马蒂亚·森 刘民权 夏庆杰 王小林 等著
Cong Zengzhang dao Fazh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4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6.5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3 000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17 世纪从英国开始并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由古代推进到了现代，工业化的不断扩展和深入也不断推进了现代社会的进步。古代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制度安排的要求有着极大差别。古代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区别是生产方式的不同。农业社会以农业为主，其主要生产单位是家庭，经济增长极为缓慢；农业社会需要产权，劳动力和土地的关系相对固定，即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也不需要劳动力流动；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因而也不需要大众教育体系。但是需要精英教育，其目的是为政府培训官员。

而现代工业社会以工业为主，其主要生产单位是企业，经济增长迅速。熊彼特认为企业和企业家是工业社会经济增长和创新的主要动力。然而，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工业社会对一国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具有与农业社会不同的几个基本要求。

首先，工业社会的主体是工商企业和企业家，因而要求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国家在其社会政治经济架构中允许各种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和企业家的存在和发展。

其次，以工商业企业为主体的工业社会需要大量可以雇佣的劳动力，这就要求在一国制度安排设计中允许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劳动力的流动。

第三，工业社会需要大量的白领职工，因而要求政府提供大众教育体系，从而为工商业企业培训源源不断的技术职工、管理和经理人

员、销售人员、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师、律师等。

第四，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需要销售，因而工业社会需要产品的存在并需要保证其正常运行。

第五，工业社会的企业和企业家需要产权保护制度。只有如此，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才能得到保护。

第六，工商业企业需要灵活稳定的融资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最先需要的就是“信贷”，在现代企业发展中，信贷构成了经济发展的要素；只有把这种生产要素托付给企业家才可能从完全均衡状态的简单循环流转中实现经济的发展。Levine et al. (2000) 发现银行给私人部门的贷款每增加一倍（相对于所占 GDP 的比例来说）几乎能为长期经济增长率贡献两个百分点。

最后，Acemoglu (2012) 还认为，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保持社会稳定和秩序。

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主体是企业 and 企业家，而且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在一国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上（或者说在生产关系上）具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因而在工业化时代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逐步形成有利于各类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包容性制度安排。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迅速适应这种转变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变成了世界强国，没有能够及时适应这种转变的国家则暂时落后受辱。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逐渐摒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和建立“包容性”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安排的过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由 1978 年的 3 亿吨迅猛增长到 1990 年的 4.5 亿吨（国家统计局，1991 年，第 346 页），农村贫困率由改革开放初的 75% 下降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不到 20%（Ravallion and Chen, 2007）。另外，农村包产到户制度

的实施还释放出了数以亿计的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可雇佣劳动力，并催生了大量非农经营企业和企业家。20 世纪 90 年代，以国企改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成就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民生的大幅度改善，同时也加速了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的局面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能力建设和社会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地制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承包制避免了贫困家庭食物不足导致的妇女和儿童营养不良的现象，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落后地区贫困家庭子女的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普通高等院校招生人数由 1977 年的 27 万人稳步上升到 1998 年的 108 万人（1977—1998 年期间累计录取 1 355 万人）。1999 年实施高校扩招政策后，高校招生的规模更是以空前速度扩大，如 1999 年为 160 万，2002 年为 320 万，2005 年为 504 万，2008 年突破 600 万人，2012 年进一步增加到 685 万人，其规模是 1998 年的 6 倍以上（从 1999—2012 年累计录取 6 568 万人）。按照这个速度，到 2025 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存量将达到 2 亿人，而美国全国的人口仅仅略高于 3 亿。再看印度，印度的土地私有制一方面造成粮食大量堆积腐烂，另一方面因大农场主集团通过游说政府而得到的高粮价又导致大量妇女儿童营养不良（Gragnolati et al., 2005; IFPRI, 2011）；就义务教育而言，印度政府在 2002 年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义务教育（Nussbaum, 2013）。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基本提供了工业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能够生存的环境、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大众教育体系、融资体系、产权保护制度、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尽管在一些领

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融资体系、产权保护等。换句话说，西式民主可能不是工业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中国政府还成功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秩序、提供了优良的公共设施（如水、电、交通、通讯）。这是中国发展模式能够成功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明治维新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政体也不是西式民主政体，但是日本在此期间也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也不是西式民主政体，但是德国当时的工业成就已超过了英国。这些经济发展事例也说明西式民主可能从来不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前提。

就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基本完成了可以依靠出口导向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实现高速增长的追赶阶段。换句话说，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主要依靠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开发。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由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中国需要不断涌现的创新型企业 and 企业家。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从制度安排角度看，中国需要拥有允许、鼓励、支持创新型企业涌现并发展壮大经济社会制度安排。能否建立鼓励和保护创新型企业大量涌现的机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期兴旺发达。建立和健全保护市场竞争和创新的社会经济金融制度安排，如允许、鼓励、支持技术创新型企业的涌现和成长，同时，还要允许大量的风险投资银行家寻找有利可图的创新型投资项目。

日本制造业之所以未能转型，是因为缺乏一批新型的具有前瞻能力的企业家的不断出现（池田信夫，2012；Hubbard and Kane, 2013）。产业升级不断推进，只有站在生产前沿的企业家才能洞悉瞬息万变的市场规律，因而需要把引领产业升级换代的任务交给千千万万个企业家而不是政府的经济计划部门。也许其中的某些企业家会犯错误而被市场淘汰，但是只要少数企业家感悟到并抓住国际上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技术和方法，这些少数创新型企业就很可能引领中国走

向创新。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面临三项任务：第一，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提供一个公平竞争框架，包括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法规，对违法行为的惩罚。第二，建立完备的产权制度。只有完备的产权制度，才能保证和鼓励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才能让富裕阶层不再移民并把财产转移到国外。第三，建设稳健的能够为非国有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银行体系，其中包括能否为高新科技技术开发融资的风险投资体系。尽管我们也有银行体系，但那基本是由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而国有银行基本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非国有企业很难从国有银行得到贷款。因而严格说来，我们缺乏为非国有企业服务的融资体制。关于如何建立灵活稳定的银行金融融资体系，这确实是一道难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难题。1929—1933 年大危机后，美国制定了旨在限制金融机构过度冒险和不负责任行为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这个法案保证了美国约半个世纪的金融稳定；然而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力度放松和金融自由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的过度冒险行为再次导致了 2007—2008 年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Roubini, 2011）。美国在金融融资体系建设上的惨痛教训警示世界各国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以防止其过度冒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Minsky（1992）提出了一个金融不稳定性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即金融行业本身在经济情况良好的状态下大幅度扩张信贷，从而导致经济过热和泡沫；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银行金融业又快速收缩信贷，导致泡沫破裂，从而连累整个经济。1929—1933 年大危机、2007—2008 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以及 Minsky 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都指向一个目标，即加强对银行金融业的监管，而且越是经济情况良好的状态下，越需要强化对银行金融业的监管。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经济泡沫的形成。

这本书的由来是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第三次人类发展论坛的成果汇总。2012年10月19日第三届人类发展论坛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教授的讲座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行。出席本次论坛及阿马蒂亚·森讲座的嘉宾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民权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处长王小林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夏庆杰教授、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驻北京办公室主任 Shan Mitra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赵忠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新业教授、武汉大学乔洪武教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俞建拖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费小琳老师、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庞丽华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袁诚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张玲玲博士、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孙梦洁博士等。第三届人类发展论坛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讲座汇集了阿马蒂亚·森的两个学术演讲、与会学者的关于中国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成果。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决定出版一个集子推介上述科研成果，并根据阿马蒂亚·森教授的演讲题目把这个集子定名为《从增长到发展》。

刘民权、夏庆杰

2014年9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1

正义与世界 1

- 一、我的关于正义的著作的出版 1
- 二、从地区到全球 2
- 三、消除不公正 3
- 四、中国在寻求全球正义中的角色 5
- 五、一个与正义相关的分析的例子 7
- 六、结 语 9

2

从增长到发展 10

3

为何要特别关注儿童的发展问题? 17

4

中国的增长与公平模式 23

- 一、引 言 24
- 二、近来的经济增长与公平模式 25
- 三、1978 年前的基础 28
- 四、1978 年之后的改革 34
- 五、“规模”负担 38
- 六、启 示 45
- 七、结 论 53

5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57

- 一、引 言 57
- 二、数据和研究方法 62
- 三、农村收入差距及贫困的变化 64
- 四、农村绝对贫困变化的非参数分解 70
- 五、总 结 78

6

包容性发展与减贫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 83

- 一、引 言 83
- 二、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包容性发展 84
- 三、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贫困与不公平 88
- 四、中国-东盟关系的简要回顾及主要挑战 90
- 五、政策建议 97

7

中国的多维贫困：现实与政策含义 102

- 一、为什么关注多维贫困问题 102
- 二、方法、维度、指标和样本 104
- 三、基本的结果与趋势 106
- 四、小 结 108

8

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理念”评析 109

9

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人口迁入 128

- 一、中国国际人口迁入的趋势 129
- 二、中国国际迁入人口的特征 130
- 三、结论和建议 138

10

地方教育投入对城镇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影响 142

- 一、引言：研究家庭教育支出行为对于教育财政的意义 ... 142
- 二、文献综述：公共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 ... 144
- 三、经验研究：数据、模型与估计方法 146
- 四、经验结果 151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55

11

影响我国儿童医疗服务利用的家庭、社会和经济因素分析..... 159

- 一、引 言 159
- 二、数据与描述统计 161
- 三、计量模型分析 165
- 四、结论和建议 169

12

中国社区卫生人力资源的探讨..... 173

- 导 言 173
- 一、卫生人力资源分析的理论框架 176
- 二、中国全科医学和中国式全科医生的发展历程 180
- 三、现状分析 183
- 四、问题诊断 195
- 五、政策建议及相应的国际经验 203
- 六、结 论 218

13

中国农村患者的医疗需求行为研究 224

- 一、引 言 224
- 二、文献综述 226
- 三、实证模型 228

四、数据说明和变量描述	230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235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243

一、我的关于正义的著作的出版

《正义的理念》是关于什么的呢？这本书试图重新检验和审视数千年来不断带领全世界的人们前进的那个——或那些——关于正义的理念。有许多种理解正义的要求的方式，在这本书中我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我也尝试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这套方法汲取了全世界的历史思维，包括印度的和中国的，而不仅仅是西方的传统思维。显然我不能在此讨论我在书中分析的所有思想，但是我认为应该介绍一些基本的观点，这些观点与我们在拓展关于正义的理念时需要持有的世界观相关。

^①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2012年10月19日在第三届人类发展论坛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讲座、阿马蒂亚·森专著《正义的理念》中文版首发式上的主旨演讲，略有删减。

二、从地区到全球

马丁·路德·金，这位伟大的非裔美国领袖，在一封写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说：“任何一处的不公正都是对每一处公正的威胁。”这封信写于1963年4月，将近50年前。那个时候，马丁·路德·金正在与发生在美国的、尤其是针对非裔美国人（也就是美国的黑人）的种种不公正作斗争。他因为在自己的国家呼吁消除有色人种所遭受的不公正而被捕入狱，不久被一个持不同观点的、在政治上反对马丁·路德·金所倡导的民权运动的人刺杀。在马丁·路德·金的一生中，他所积极从事的政治活动几乎全部与发生在美国的不公正现象有关，但是马丁·路德·金的哲学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关注地域性的不公正问题。作为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马丁·路德·金看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大量的不公正现象。他认为，生活在任何地方的、有理性的人都有理由去帮助世界各地那些遭受不公正、剥削和歧视的人。

从对涉及自己国家的地区性公正的追求，过渡到对世界范围内的全球性公正的关注，对充分理解关于正义这一学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公正的诉求可以在某个地方发起（像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所做的那样），但是其基础必须是普遍性的：它们不能只局限于某个地方。马丁·路德·金为什么要拓展其伦理思维的范围？这一问题关乎准确理解正义这一概念的大议题：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在之处看到的情况，认为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不公正“与我们无关”，那么我们就没有与不公正进行全面的斗争。

为了民族狭隘性或只把注意力局限于某个地区而辩护的借口常常是，如果尚不清楚一个“全球公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不能够对世界上的公正和不公正进行思考。这里，我想谈谈在我所努力陈述的，关于正义的理念的分析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认为

以下观点是错误的，即认为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任何创造性思考都需要首先——至少对一个国家来说——就“绝对公正”达成某种一致的见解。我要说的是，全世界几千年来对正义理念的基本运用并不是为了追求某种绝对公正的乌托邦，而是为了消除那些可辨识的而且能够得到解决的不公正。

三、消除不公正

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旧称是“实践理性”，请注意，这一名称中对实践的强调是有启发性的。它说明，“实践理性”的终极目标必须是为行为和政策选择提供指导。与此相反，实践理性在哲学中却常常被视为非常理论化的东西。实际上，在“社会契约”推理的传统下构建起来的主流正义理论，常常脱离了实践理性中的实践性，而把精力集中在对相当抽象的、绝对公正的要求的研究上，尤其是对如何辨识“理想的公正制度”的研究上。当代政治哲学中主流的正义理论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从“社会契约”的视角来思考问题，并寻找相应的理想的公正制度。

社会契约方法由托马斯·霍布斯创立于17世纪，从18世纪到今天，它一直极大地影响着对公正的分析。该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对“公正制度”的描述作为公正理论中一项主要的——并且常常是唯一的——可辨识的任务。用这种方法看待正义会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但它们均围绕一个想象中的“社会契约”——一个假想中的、得到生活在某个主权国家的人们所支持和接受的、关于社会组织的契约——展开。

如果具体描绘理想中的公正制度真的是正义理论的中心任务（而这正是社会契约法所持有的观点），那么除了那些被“理想的安排”奉为神圣的东西之外，任何其他安排都可以被视为是不公正的，而这就

削弱了在现实世界范围内对寻求“更多公正”的重视：我们必须寻找绝对的公正（按照这种有限的视角），任何不是绝对公正的事都不值得去做。事实上，如果我们只是局限地分析怎样去取得绝对公正——而且仅仅这么做——那么所有关于消除世界上这种或那种不公正的大规模辩论和诉求就似乎都变得不合理了。这不仅对实践理性的实践性来说是个巨大损失，而且对其理论性来说也是如此。社会契约方法似乎以一种追求绝对完美的理论取代了关于实践的理论。结果，社会契约方法变成了一种关于公正和非公正这样的实践理性问题的非常格式化的探究——无论是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这可能使我们最终一无所获，因为实际上对什么是绝对公正的确切要求也许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看法，甚至在以公平的立场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理性人中间也是如此。

为社会契约方法作出主要贡献的有霍布斯，后来的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相较于其他人，伊曼努尔·康德的贡献尤为突出（尽管康德同时也提出了其他推理路径）。在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引领下，契约论方法一直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主导力量。他的经典著作——出版于1971年的《正义论》，提出了一种研究公正问题的特别的社会契约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正义的主要理论，不仅来自罗尔斯，而且来自罗伯特·诺齐克、罗纳德·德沃尔金、戴维·高蒂尔等人。尽管他们对社会契约究竟隐含哪些要求的判断上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在对社会契约方法的认同上，以及在由这一契约来确定社会制度的思想上，是一致的。既然这些制度需要实施，就需要一个主权国家根据其认定的社会契约来建立这些理想的制度。

当然，这就意味着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全球公正”的思想，因为根据社会契约方法，正义这一理念完全依赖于存在一个主权国家以及由它所发挥的作用。然而，现在还没有一个全球性的主权国家，而且